

ITALY



外交故事汇

穿越意大利时光

◎ 郁泉锡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ITALY

外交故事汇

穿越意大利时光

◎ 郁泉锡 著

目 录

中意漫长建交谈判轶闻	001
为了国家多赚些美元！	015
吃一堑，长一智	
——见证“黎明号事件”	025
小城故事多	
——话从“旧金山”的名字说起	037
我为周总理做翻译	061
让中国回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073
“罗马第八王”、“音乐家”与“臭老九”	084
一石击起千层浪	093
古罗马缘何强盛？	106
初夏的那次意大利之行	122
蓝色的海洋	134
看来“软”实际硬！	152
想起那位杰出外交家	172
失去了，永不再来！	185
难忘的葬礼	201
一举一动都是照自己的镜子	208
文化遗产何其多！	218
说说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235



道不尽写不完的佛罗伦萨	249
话从那座跨海大桥讲起	270
“他的贡献其实比马可波罗大”	285
从“鲜花广场”到昭雪平反	298
莫德纳，一个响亮的名字！	310
幕后“英雄”	322
“有时，这里像牢房”	333
飘香四方的节俭之风	346
一个伟大的比萨人	365
别开生面的“外交官聚餐会”	378
人啊，真难说！	388
从那位瑞典教练开始聊足球	401
质量犹如生命	434
看不透的梵蒂冈	446
闲聊意大利歌剧	469



中意漫长建交谈判轶闻

1969年初，作为南欧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意大利外长南尼就在议会宣布意大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中国建交。

那个年代，意大利政府的这一举动在世界上的反响是相当大的，尤其轰动了大西洋两岸，大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很惊



1971年意大利外长南尼应周总理邀请来华访问，游览杭州西湖。前排右二为南尼，二排左一为作者。

讶，怎么意大利这个欧洲重要盟国突然宣布承认中国？亚平宁半岛究竟发生了什么？

南尼谈不上是意大利的“戴高乐”，但至少可以说，他有一股政治家的魄力与勇气！

早在1965年中意两国互设商代处不久，他就避开公众视线，在罗马30公里郊外一个著名温泉城——菲乌奇的酒店里会见了中国商务代表。当时他是副总理，向中方明确指出，那场震撼世界的越南战争，美国深陷泥潭，打了几年已经碰得焦头烂额，美国迟早要从越南撤军，只是时间与机会问题；意大利看到中国在亚洲与世界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愿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他们正在寻找时机……

可以说，1964年中法建交的重大行动多少触动了一山之隔的意大利。戴高乐将军的勇气在意大利朝野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议。对华关系，意大利停步不前还是向前走一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除了一些反对声外，基本主张向前走，就是步子跨得多大，看法并不一致。

1964年底，廖承志与雷任民抵达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代表经过友好商谈，决定中意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两国签署协议，各在对方首都很快设立了商代处，可以说意政府向前跨出了一小步，推动了中意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自1965年初商代处建立以来，中意经贸与文化交往就比以前密切多了。不少意大利有眼光的商界人物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中国商代处开设后的头几年，虽然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但业务量大，意大利大中小企业纷纷同中国交往与洽谈，两国贸易量明显增加。不少意大利商界朋友讲，意中都是文明古国，两千年来交往不断；到了新时代，反而交往减少了，不符合潮流！马可波罗冲破重重困难，历时3载半，到了中国，见证了封建时代中国的一段时光。他写的《百万》（意大利文版《东

方见闻录》书名)多少意大利人读了之后，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都很向往！今天意大利更有理由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1969年年初，南尼终于勇敢跨出了一大步，不顾美国与苏联的多种压力，宣布意大利承认中国，准备与中国建交。南尼的这一果断行动，折射了意大利人民发展对外关系的良好愿望。他在议会宣布的第二天，意大利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新闻加以报道。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熟悉我们的几位菜贩也对我们说：“意中两国快要建交了，以后你们要在罗马设立大使馆，来的中国人多了，我们欢迎你们！”

建交谈判很漫长

谁也没有料到，南尼宣布意大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两国的建交谈判并不顺利，竟拖了两年多。

为什么？因素多多，也许同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意大利政府频频更迭有关吧！

谈判在两个渠道进行，一个是官方，另一个为非官方。官方渠道在中意两国驻法使馆，参赞级会晤。我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非官方谈判，南尼外长的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顾问博林与我国商务代表的频频会见，一次又一次。

想起我们同博林的接触，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位40开外的高级外交官，一表人才，很有气质，柔中有刚。我们的接触选在罗马一个幽静的地方，既不是意外交部，也不是我国商代处，这样也许可以避开一些公众视线，不受媒体与外界的干扰。

双方谈得最多的，自然就是“一个中国”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类的话题。因为那时意台还有“外交关系”，台湾在罗马设有“大使馆”。有意思的是，还有台湾



驻梵蒂冈“大使馆”。人们爱称“永恒之城”的罗马，台湾两个“外交机构”，也许独一无二！

意大利与中国建交，势必先要意台“断交”，并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在那时真要谈得合拍，并不容易！谈判中，对方有时口头上可以承认，而真要落实到书面，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在谈得不顺的时候，博林也会将话题拉到二千多年前。他说，早在公元2世纪中叶，中国接待过罗马帝国的“安敦使团”，这是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商业使团。世界各国的关系，一般都是商人先行，可以列举很多。他们把中国的茶叶、丝绸与瓷器早就传到意大利与欧洲。说明意中关系源远流长，尤其是连结欧亚两块古老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拉近了两国的距离，而且直到今天，还是两国悠久交往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一天，博林应邀来中国商代处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一次次非官方接触，政治谈多了，重复过多少次的话题，席间，双方约好不再重提，而要轻松一下，避开政治，多聊些历史文化与天文地理。

博林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颇感兴趣，说一位未成女皇的“女强人”居然手掌清朝实权长达几乎半个世纪，实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闻。

他这么一说，我国商务代表顿时赞扬他的中国近代史功底不浅呀！他说看过几本介绍清朝的书，是西方传教士写的。接着，他就问，可是许多西方人并不理解，堂堂大清帝国怎么会在一场海战中输给一个小小的日本呢？我们讲，那时的清帝国闭关自守，已经衰落腐败，国力空虚。在列强争霸的年代，落后意味着挨打。

博林还谈到颐和园附近的“另一个更大更华丽的园子，可惜毁于一场历时50多天的大火”。还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

不少事件惊心动魄，震撼世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浩劫与悲剧，我们也谈了好多。后来，话题还转到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让这场宴请轻松了好多，不再像非官方渠道谈判建交那样紧绷住神经。我们边吃边聊，加深了相互友情与了解。他对我国历史文化看来怀有浓厚兴趣。

我想，当好外交官，不仅要牢牢掌握中央政策，熟悉国际政治，精通外语，而且还要有渊博知识，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什么都要懂一些。这样，话题才能谈得深，交往才能展得开。如果肚里无货缺货，别人一问三不知，下次见了你，他们便会敬而远之！

民间对华了解太少

我们20世纪60年代刚去意大利学习，意朋友问我们哪里来？当我们回答“来自北京”时，经常听到他们重复一句“共产党中国”。他们长期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华敌视宣传与反共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头脑里充满怀疑及糊涂概念，一提中国，不是说“共产党中国”，就是说“国民党中国”。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便会好意纠正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简称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像“意大利共和国”简称意大利一样。有的人，我们解释了半天还同你纠缠，说什么“中国由共产党掌权，一党专制独裁”等等，所以称“共产党中国”，这就是偏见或不怀好意了。

意大利极右作家马拉巴特20世纪50年代访华时，带着反华反共的头脑来中国走访了一个多月。来中国之前他甚至以为中国“共产共妻”、“共产党是硬邦邦的，残忍的”。到了中国，的确，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天天展现在他面前，但是他边参观座谈，边思考与记日记，头脑里一天天少了几份固执与偏见，在



中国访问游览，他看到穿着补丁衣服中国人面带微笑，朴素善良，内心充满温情柔意。他天天坚持写日记，白天看晚上写，在饭店里如实记下他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说：这是我亲历的，完全真实，不是听别人讲的！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慢慢改变着他对中国看法。访问结束时，他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中国接待部门关怀体贴他，派权威医生一路陪他回到罗马。访问后他在病中继续写书，一本名叫《我在俄罗斯与中国》的书出版发表了。当时有关中国的书籍少得可怜，许多意大利人读了他的书，大受影响。

我刚去意大利留学，在罗马与朋友交谈，或者上罗马大学，听好几位意大利朋友讲，读了马拉巴特的书，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本来以为共产党在中国不讲理、缺乏温情，原来并非如此。不过中国太遥远，1949年前后中国发生的事，意大利人并不了解，而读过马拉巴特书的人也毕竟有限。

20世纪60年代，我陪同中国艺术团在意大利访问演出，从北到南转了十多个城市，天天与戏院、剧场打交道，上至剧院总监、经理，下至布景搬运工。闲聊中他们经常会问“中国可怕吗？”我反问“为什么你们问可怕？”回答是：报刊上讲的，说“共产党在中国专制统治”、“中国没有自由、不讲人情”、“对地主与富农乱斗乱杀”等等。更多人认为：“中国很神秘，我们不了解！”

20世纪50年代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总理为外国友人放映了我国刚刚拍摄的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总理特意交待翻译，告诉老外是《罗密欧、朱丽叶》中国版爱情故事。在当时西方遏制中国与反共反华的大背景下，要让外国朋友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充满温情柔意，共产党讲道理重人情，不是西方有些人讲的什么专制独裁、铁面无情。

由此可见，文化与宣传这个软实力之重要。有人讲，谎言

重复一千次成了真理。谎言终究是谎言，但谬论、谎言、偏见、歪曲与不实报道在媒体上传播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中意两国建交前，意大利民间对中国很不了解；中国民间对意大利这个文明古国充满友情，但同样缺乏具体了解，当时连意大利足球、美食、葡萄酒、橄榄油、时装、美声、油画雕塑、大理石、皮革等优势，国人中知者也不多。

山那边传来一股“火药味”！

中意官方渠道的建交谈判开始1969年2月，直至1970年11月签署建交协议，长达20个月。

期间，意大利换了4届政府。两国宣布建交时，由于意政府走马灯式更迭，南尼早已离开政府。

我在商代处期间，有位文化人士，名叫卡贾蒂，他爱以意总理“顾问”的身份自居，频频穿梭于我国商代处与我国驻法使馆之间。卡氏只有40开外，早已秃头，思维敏捷，口才颇好，讲什么事都有他的一套理论。几乎每次跨进我国商代处大门他都会说“从总理府直接来的”，让人真假难辨。夫妇俩领养了几个越南孤儿，加上自己的，大小7个孩子，家里成了一个“小幼儿园”。他的夫人很瘦小，像他一样，敏捷机灵，自动挑起抚养与栽培孩子的重担。

卡贾蒂马不停蹄，到了巴黎，常常见到两国建交正式谈判的中方翻译蔡方柏。后来过了几十年，蔡出任我国驻法大使，有几年我们同在外交部西欧司，相处很熟。但蔡方柏的名字，我首先是从卡贾蒂嘴里知道的。

巴黎那边的官方谈判情况，卡贾蒂常会向商代处通点气。巴黎谈得怎么样？给我的感觉，曲折多变，有时向前走；有时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异常激烈，觥筹交错，争执不断。我从卡



贾蒂嘴里或多或少闻到一些巴黎传来的一股“火药味”。联想到在罗马我们同博林的非正式接触，可以想象，罗马、巴黎，一南一北，相距不过几千公里，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气氛并不轻松呀！

中意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意方不愿在建交公报中写上，“意大利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私底下、口头上可以讲；落实到文字，就很困难。那是因为，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意大利受到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还有苏联。

那时的中苏关系错综复杂，还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关系掉入冰点。欧洲有些人希望“祸水东移”，那几年毛泽东见欧洲客人也常常爱谈这个话题。意大利宣布承认中国、与中国建交，同中国交恶的苏联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可以想象，它对意大利的压力也是不小的。所以自南尼在议会宣布承认中国后，我在多种场合听到，意大利政府的压力既来自大西洋彼岸，又来自欧洲东边那个大国。

我知道易素之、宋之光和田志东三位参赞先后同意大利驻法使馆参赞卡尔迪尼进行过建交谈判。

易参赞本是1964年访欧演出的中国艺术团秘书长，在意大利辗转两个月，我们朝夕相处。可惜他出任驻法使馆参赞后，未有机会再见到他，否则我会向他打听有关正式渠道谈判情况的。

有一次，宋之光大使去罗马，好不容易，机会来了。我陪他参观罗马古迹时，自然聊起这个话题。我知道他在我国驻法使馆任参赞期间，与意方代表——意驻法使馆参赞卡尔迪尼于1969年9月到1970年9月谈了整整一年，这是一段最重要而又关键的谈判时刻，见证了曲折而又漫长的中意建交谈判点点滴滴。宋大使应对这场谈判一目了然，让我对他兴趣浓浓，一连

提了好几个问题。

他说：“真是说来话长呀！建交谈判不是请客吃饭，从来就不轻松，更不用讲同意大利人谈判了！有时一见面谈气候，喝茶聊历史，其实也有种种含义。总的来说，谈得相当艰苦！那位不高不矮的意大利参赞卡尔迪尼，是个久经考验的职业外交官，反应灵活，而且嘴皮厉害，挺油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们这次向前走了几步，本来我们希望下次有望取得共识，可以向前走了；可是见了面，他又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后退了。双方澄清之后再作说明，反反复复很费劲！总之，围绕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问题，断断续续，谈了又谈，真够折腾的！”

宋大使笑了笑，接着说：“中意建交，应该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交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自中法正式建交后，西欧主要国家只有意大利同我建交。我主持谈判，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吧！我不会忘记谈判中的风风雨雨，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为建交谈判，我们花费很大精力，因为这是一件大事，要按照国内指示谈好。我们同意大利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走向破产！对当时充满敌意的苏联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意大利是一个有影响的欧洲国家，尤其在南欧，地处重要战略位置。在新形势下，我们同这个文明古国谈判建交，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西欧一些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来说，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位友人搭桥梁

意大利战后以来党派林立，左中右党派都有，意共与社会党属左派。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意共同中国关



系也很冷淡，而社会党对华奉行友好政策。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国际政治，无时不在影响党派之间的关系与交往。

在此以前，即1964年6月，社会党议员维托雷利（Vittorelli）访华，中法宣布建交过了4个月。他向中方明确表示，意社会党愿意推动意大利政府发展对华关系，显然反映意大利政府对华态度的变化。我们给予高度重视，毛主席会见了他。毛主席一生见的意大利客人并不多，这次会见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尤其是社会党的《前进报》，作了大幅报道。

陪同访问的另一位社会党人桑塔尼罗（Santaniello），是意大利外交部经济司高官，当然也见到毛主席。那个年代能见到毛主席，用桑塔尼罗自己的话来说：“终生难忘！意大利人见到毛泽东的，屈指可数。毛泽东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我以此为荣！”

我在商代处6年，他同我们的联系与交往相当频繁，有时谈到中国与北京，他嘴上常挂着“见到过毛泽东”这句话。

可以讲，圣塔尼罗为我国商代处与意大利官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早在我国商代处成立之初，他就对我们说：“意中建交是迟早的问题，意大利政府将会跨出这一步，问题是什么时候？如何跨这一步？目前意方有些困难，而且麻烦多多。各党派对华态度不一，同一党内也有分歧与争论。国际上意大利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大小不同压力。”他相信，与中国建交迟早将是摆在意大利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据他估计与预测，“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连他也没有料到，从他讲“一段时间”那时开始，居然过了漫长的6年，两国才建交。

桑塔尼罗作为意外交部经济司高官，会及时将我方在中意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观点与立场带给官方，他的作用不可低估。每当遇到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虽然我国商代处可找对口部门——意大利“外贸协会”交涉，但他的作用有时似乎比“外

贸协会”更灵一些。他任职于外交部，又在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多年，在意大利外交部被称为意大利的一位“中国通”。每次我们一谈中方观点，他能即时理解，随时向我们解释意大利的法律与国情，从中沟通与斡旋。有时会说：“我把这一问题带到外交部经济司研究，有了消息，告诉你们。”

有一次我应邀去他家作客，见了真让人大吃一惊！从客厅、餐厅到卧室，几乎找不到几件意大利家具与装饰，夫人风趣地说：“我们把香港都搬回了家！”又抢着补充：“好些珠宝首饰还藏在保险柜里呢！我国驻外机构人员的待遇优越，香港价廉物美的东西太多太多，走进大商场看花了眼，大有选择余地。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在那里工作生活多年，为什么不买？”

圣塔尼罗请我们随意吃了些东西，喝了少不了的卡普奇诺咖啡与葡萄酒。他说，朋友之间在家里随意聊聊，可以敞开心扉谈。

他们聊到在香港的感受，讲了一番话：“从香港观察中国内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你们国家大，问题也多，我专心研究，好多事依然看不透。香港像意大利，报纸太多，各派意见纷争；同样一件事，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有人可以说成黑，也有人可说成白，让我们这些外国人真假难辨！我是带着分析的头脑看问题的，不人云亦云，听了要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对中国满怀友情。请你们相信，意大利外交部里，我是‘促进派’，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意中两国尽快建交！”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馆舍

这里还有几段故事。

因为我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时，相当一段时间意大利、法国同属一个处，对我国驻法使馆馆舍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它原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驻法大使、旧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花了5万美元购买的。1964年中法建交后，为这所馆舍的归还，中方同法方进行了一次次交涉，没想到，前后拖了3年之久，直到1967年3月，在戴高乐总统的关怀下，法方才归还给了中国。

那么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是否也有相似的故事呢？

我刚去罗马读书，就听到一位意大利知情者讲过旧中国驻意使馆馆舍的有关情况，他竟能讲得头头是道。

据他说，那幢漂亮的大楼原为一位犹太富商建造，后来成了中国大使馆馆舍，是这位富商赠送中国的。

遗憾的是，他没有讲事情的前前后后。如果真是按他所讲，这位犹太富商为什么要赠送大楼给中国？我一直在想，是否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万犹太难民从枪林弹雨的欧洲逃到上海避难，上海人民伸出温暖的双手，同苦难中的犹太人热情相助相处的感人之事有关呢？我一再问他，这位意大利朋友无法解开这个谜，他只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究竟是不是，不知道了。

这所馆舍位于罗马市区黄金地带，知名的诺萌塔纳林荫大道（Viale Momentana）旁的一条名叫波拉（Via Pola）的幽雅的小道上，闹中取静，一幢富丽堂皇的大楼。附近就是墨索里尼待过的著名的托洛尼亚别墅。

这位意大利知情人继续说，20世纪50年代，大概由于蒋介石刚到台湾立脚，财政严重拮据，台湾当局没法承担这幢大厦不菲的开支，譬如说，大楼需要维修与保养，日常维修花钱不少，加上支付庭园园丁、清洁工的工资，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窘迫之中，台湾竟把这所豪宅卖掉了。后来这里成了罗马“路易斯大学”（也称为罗马“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实在太可惜、太遗憾！

我始终对它很好奇，几次前去探察。到了那里，大门一直紧闭着，外面是高高的围墙，院里的大楼露出好几层，我没法进入院内，不知其“庐山真面目”呀！我很失望。心想，虽然早已一场空，再也不是中国的财产了；但它毕竟同中华民族的外交史，多少拉上了一点关系呀！

1970年11月6日中意宣布建交后不久，我国很快就在罗马建立大使馆。临时代办冯显弼赴任时，设在罗马帕依西埃洛路（via Paisiello）的中国驻意商代处，立即变为大使馆临时馆址，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的牌子首先挂在这里。

后来不久，我们买下了罗马布鲁塞尔大街56号（Via Bruxelles 56）的一幢别墅。这里环境幽静，离葱郁碧绿的阿达公园咫尺之遥，属于许多罗马人羡慕的高雅的帕里奥利街区。不少意大利朋友说：“你们购买这幢别墅，街区好，房子升值空间大，很值！”

别墅原是意大利巴多利奥（Badoglio）陆军元帅的官邸。他是意大利现代史上一位有着争议的人物，曾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中卖过力。1943年出任意大利王国首相。墨索里尼被捕之后，意大利政局急转直下，国王无可奈何，授命巴多利奥组建新政府。巴上台后不久，一面同纳粹德国继续结盟，一面又忙着同已经在意大利南方登陆的美英联军谈判。1944年形势急剧动荡，他被赶下了台。战后回到他的家乡彼埃蒙特养老，病死于1956年。经中介与朋友介绍，后来他的家人将这幢别墅卖给了中国。在意大利，凡是上了年纪的，只要提起巴多利奥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

中意两国建交的一段故事一直留在我脑海里。风风雨雨几十年，我的一生与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中意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所经历的一件重要往事，它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我要把它写下来。